

“轻深传播”：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的赓续策略——以泸定桥精神传播为例

◎张志君

【内容摘要】本文从“泸定桥精神的由来”切入,描摹了泸定桥故事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指

出了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绝不应掉以轻心,并且

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新复杂语境中赓续红色记忆的相关传播策略建议。主要包括:“从单一的传统媒体

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转变”“从单次传播向多次传播乃至 N 次传播转变”“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

离向表深结合的‘轻深传播’转变”等。

【关键词】泸定桥精神;集体记忆;传播策略;轻深传播

一、泸定桥精神的由来

1935年5月下旬,数万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艰难跋涉到了大渡河边,当时的情形是,前有波涛汹涌,水流湍急、难以逾越的天险大渡河,后有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形势可谓万分危急。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在当时曾多次预言宋、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廖大珠等22位红军勇士在一昼夜急行军240华里基本没有休息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已经被敌人抽去了桥板且放火焚烧的泸定桥上与敌军拼死搏杀,在战友们的配合下,击溃守军两个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在没有空中力量和水上力量配合下的一个勇夺天险的奇迹。

83年后的2018年5月29日,笔者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的邀请,前往泸定桥所在的四川省泸定县参加“红军飞夺泸定桥精神研讨会”,并到现场实地凭吊,怀着崇敬的心情,现场占一首《满江红》词:“大索横河,凭吊处,心潮激荡。抬望眼,目极远眺,恍回战场。廿二勇士成与败,数万红军兴或亡!非夸张,有翼前鉴,人心伤。瑞金旌,永难忘。东洋恨,何时偿?!党指引,纵火海不彷徨!社志勇克地形劣,气势令敌心胆丧!应欣慰,自有后来人,响当当。”词虽不工,甚至可能不一定合乎古律,但却道出了笔者当时对于革命先辈的敬

仰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的确,当时的历史真的是“廿二勇士成与败”关乎到“数万红军兴或亡”,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真实的历史,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泸定桥精神”。

二、飞夺泸定桥故事及其精神的传播变迁与传播变异

清代著名文学家郑板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的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爆发,手中之竹又不仅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段话虽然说是画竹,但用来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述之间的关系也无不可。泸定桥故事及其精神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经历了由“院中之竹”(历史事件)到“胸中之竹”(历史感悟)再到“手中之竹”(历史记述)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至少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变迁阶段:

一是萌芽及区域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35年。1935年5月29日,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当事人通过一番“胸中之竹”的酝酿,将“院中之竹”变成了一种“手中之竹”,这种“手中之竹”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以有限的传播载体(书籍)进行传播,而且这些传播具有来自不同的传播主体但却指向同一内容的多种信源的特点。

二是面向全国大众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55年。195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题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广大读者才知道彭加伦以“飞夺泸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时期发生的这个故事。其后,相关故事被收录进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材中,面向数以亿万计的读者进行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手中之竹”的组织传播化,尤其是收入教材,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进行相应的组织传播,使得泸定桥故事和在其基础上生发出的泸定桥精神成为绵延几代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说法:“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物。”

三是国际传播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64年。这一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名义出访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六国,进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审查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从此开始,“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际上得以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手中之竹”的跨越国际化,使得“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且也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相关民众关于红色中国的一种集体记忆。

四是领袖题碑肯定阶段。对应的时间起点是1985年,这一年的5月,中共四川省甘孜州委、州政府、军分区在泸定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纪念大会和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亲笔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碑名。聂荣臻元帅亲笔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

当然,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在泸定桥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刺耳的杂音。其中一个来自一个旅居英国的华人张戎,她在1991年出版于英国的书中说,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红军到达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另一个据说是自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布热津斯基也说过容易让人不好意的人对飞夺泸定桥产生负面联想的话。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两面人”鲁炜主政国家网信办期间的不作为,使得网络一度成为了有害信息和虚假信息的“避风港”和“化外之地”,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进行解构乃至颠覆的歪风邪气一度甚嚣尘上,“泸定桥故事”的传播出现了让正义的人为之心痛的可怕变异。流传了几代的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

三、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面临被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绝不应掉以轻心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靡人之族,必先灭其史;绝人之种,必先灭其教,必先灭其史。”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要灭亡别人的国家,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破坏别人的建筑,败坏别人的社会秩序和法纪,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埋没别人的才能,废除别人的教化,必定要先毁去他们的历史。“去其历史”乃是所有心怀叵测的人最常用的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巨变,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对包括但不限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苏共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把控,积极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去苏联历史”,大肆丑化革命领袖斯大林甚至列宁,在戈尔巴乔

夫的默许下,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国际呈现上得以传播。这一时期的传播特点是“手中之竹”的跨越国际化,使得“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且也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相关民众关于红色中国的一种集体记忆。

无独有偶,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除了在经济上动辄威胁增加进口关税等贸易手段之外,那些一直怎么看中国都不顺眼的敌对势力肯定不会放弃任何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至颠覆是他们所乐于见到甚至非常愿意亲力亲为的——笔者这样说可不是像有些所谓的“公知”所冷嘲热讽的那样,是什么“愤青情结”,而是实实在在有“公知”们顶礼膜拜的“歪果仁”,而且还是顶级的“歪果仁”的话为证的:曾任“美国之音”台长的杰弗里·科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指出,“冷战”后“美国之音”的首要任务就是颠覆共产党及极权国家。联系到近年来不断有人用充满恶意的调侃语气恶搞包括但不限于邱少云、董存瑞等在内的革命先烈于史博得更多的点击率和关注度,联系到刚上台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就急于修改台湾地区中小学历史教材,急火火地“去中国化”,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也不应对于那些对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记忆进行解构乃至颠覆的行为掉以轻心,否则的话,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亵渎,就是对影响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亵渎!

四、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如何赓续

全新复杂语境中红色记忆的赓续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立国之基,关系到新中国不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褪色的大问题。

由于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红色记忆的赓续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语境。为了确保红色记忆的赓续,笔者认为,相关传播至少应做到并且做好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转变。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通过相对单一的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无论是早期的书籍载体,还是后来的报刊、广播、电视载体,这些媒体或载体虽然介质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属于“把关人”基本可以由或正在话语层进行把控的平台,就算是

外面的声音再多再杂,只要管住“把关人”,就可以确保导向不出偏差。而基于数字化的互联网传播则在问世之初就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当“老革命”遇上“新问题”的时候,就有必要做到并且做好从单一的传统媒体传播向多媒体传播乃至泛媒体传播的转变,变“领导时尚”为“引导时尚”,相关主体要适时将自己的角色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调整为与广大网民打成一片的“参与者”,不断累积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从而变“要他信”为“他要信”,变“要他信”为“他要信”,仅以“泸定桥精神”传播为例,就可以借助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是泸定桥精神”等的相关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既发动了网民,引发他们对“泸定桥精神”的正向关注,又可以因势利导对网民进行相关引导,从而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成效。

二是从单次传播向多次传播乃至 N 次传播转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对事物的识记有些通过一次感知后就能达到,而大部分内容则需要通过反复感知,使新的信息与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形成联系才能成。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都是许多事情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重复才能达到预期。在传统媒对比对比较简单的语境中,红色记忆的传播有可能一次传播,终生不受影响。但是,在新媒体传播的复杂语境中,想要依靠一次传播就使得相关传播对象印象深刻,这恐怕是过于理想化了。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各种媒体,调动各种手段,反复进行多次传播乃至 N 次传播,以期对相关对象产生不断的刺激,使得他们不断强化对于包括但不限于“飞夺泸定桥”在内的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

著名历史学者,畅销书《秦谜》的作者李开元先生有一个说法,叫作“3+N 的历史世界”。他认为,史实是第一历史,是存在过的往事;史料是第二历史,是古人留下的讯息;史书是第三历史,是基于史料的论述。在这三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历史作品,则属于“N”。

就“泸定桥精神”等红色记忆的传播而言,除了借助各种大众传媒之外,还可以借助李开元先生所说的“第二历史”也就是各种史料,通过重新建构特定的物理空间即展览馆或纪念馆开展相关陈列进行传播,相信肯定会收到一定的效果。

三是从表层传播与深度解读分离向表深结合的“轻深传播”转变。“轻深传播”是笔者仿照“轻奢风”“轻奢品牌”等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其意是指介于“表层”与“深度”之间的一种传播样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一方面是

各种资讯的海量供给,一方面则是相关资讯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了大量的“冗余”信息。所谓“冗余”在中国古代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引进西方的信息论之后,“冗余”(edundancy)成了信息编码术语,被用来指称冗余的信息成分。在我看来,这些多余的信息成分至少包括两种,一种是无益无害的信息,一种是有损有害的信息。无论是分辨哪一种“冗余”信息,都需要具备一定相关知识的熟悉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表述的相关行为主体,及时伸出援手,帮助不甘居于下游的网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如果说“轻奢代表一种文化素养”,那么,“轻深传播”代表的则是一种对于相关历史和文化的积极负责的精神。这方面有很多鲜活的范例,同样是传播红色记忆,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就广受包括网民在内的读者们的欢迎甚至追捧,据媒体披露,截至2012年2月,该书已连续印刷30次,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成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书籍。11《苦难辉煌》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了“轻深传播”的方式进行了以往很少有人尝试过另类红色文化传播。

五、“轻深传播”关键应该把握好几个度

“轻深传播”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度。

一是“程度”。“轻”和“深”都具有相对性,何者为“轻”?何者为“深”,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众传播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度”,理想的“轻”应该是通俗而不庸俗,轻松而不轻浮,理想的“深”应该是深刻而不故作深奥。

二是“角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立体的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多维体,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关键是找到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倘若找到了这种角度,基本上就等于向成功的路上迈进了一步。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之所以受到追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苦难”与“辉煌”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为红色历史的文字传播的创新性叙事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

三是“向度”。在泛媒体时代,单向传播极有可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因为每个行为主体往往都“一体而多构”,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这种语境中如想确保红色文化的成功传播,就必须考虑传播的向度,通过巧妙的互动环节设计将传播队伍做大,把每一个潜在的受众都变成显在的传播者,这其实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一再强调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朋友变得多多的”的当下含义。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兼《教育传媒研究》编辑部总编辑、研究员)

从红色符号到红色基因看泸定桥精神的提炼与传播

◎张学琴

【内容摘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红军飞夺泸定桥是长征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战斗之一,并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泸定桥精神从红色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符号视角来看,具有长征精神的共性,同时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对当下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正向激励作用。

【关键词】红色符号;红色基因;泸定桥精神

意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再现了一个历史事件,即长征中毛泽东曾在苟坝这里的一个晚上,提着马灯前去找王稼祥商议相关的军事部署。同时,纪念馆还专门设立了红军马灯展览室,收集了红军当年曾经使用过的各种马灯,以承载历史、传承精神。

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上,符号是主要的载体与介质,能够在编码和译码的转化过程中,形成特定的文化意义。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学派认为:“一切的文化事物都通过传达意义,而所有的文化现实都通过符号来衍生意义。”红色符号源自于革命历史实践,同时,在进行红色文化传播的时候,降低了传播的成本,提升了传播效率。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和纪念馆的设立,也正是红色文化传播的符号化过程。1935年5月29日,刘伯承在泸定桥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在这里,竖一个碑,记下战士的不朽功勋。”

聂荣臻回答说:“对我们胜利了!全国革命胜利后,要在这里造一座纪念馆,纪念我们的烈士,让子孙万代永远记着他们。”

1935年5月30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到了泸定桥头,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大平军,我和朱老总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走到桥中间,他对随行的警卫员阙中一,说:“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

1985年10月18日,“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写碑名,聂荣臻撰写碑文。碑文中写道:“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成功,打破了蒋介石

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梦想,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再次体现了我英雄红军无限忠于人们革命事业的伟大无畏精神。红军的功勋永垂不朽!红军精神万岁!”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由红军雕塑和抽象的铁索符号构成,高高矗立在纪念馆的中央,令游客在瞻仰的时候,感受到铁索的威力和红军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诗的形象呈现。

立碑是对红色文化纪念的符号化的实践,使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战斗和重要人物,能够凝聚在一个载体中,从而承载记忆与精神,以影响后世。

二、泸定桥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内在逻辑

“红军长征在四川,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两次会议和其他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四川境内召开。”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在四川最为激烈、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长征中的疲惫之师,在接到命令后,急行军240里路,面对天险大渡河,能够在极其危险的铁索桥上,奋勇冲锋,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是做不到的。其“奇绝惊险”驰名中外,显示了红军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信仰的革命精神和攻坚克难、敢于牺牲的担当精神。

精神的提炼是对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特定信念的一种总结性表述,使丰富的内涵能够在凝练的传播中被人们广为接受和认识,比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历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伟大精神谱系,正如中央

文献研究室的陈晋所说:“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由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组成,进而形成了一个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精神谱系’,这个精神谱系炫目多彩,前后相接,多以地点、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如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

长征精神就在这个精神谱系里面。党的精神的形成,有其组成元素和关键概念。陈晋认为,延安精神的组成概念是“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也就是说,延安精神是由这几种精神作为组成元素形成的,每种精神的内涵必然有几个特定的概念。

同理,长征精神与红军飞夺泸定桥精神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

对于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提炼,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以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泸定桥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具有长征精神的共性,另一方面又有它的个性,是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

三、泸定桥精神所蕴含的红色基因

聂荣臻元帅说:“我们和国民党的

斗争,常常是棋高一招,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挥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胜利之旗,重结必胜之果。”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一个党一支军队的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因此泸定桥精神第一个红色基因便是“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信仰的革命精神”。

《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红军在长征途中一天一夜步行240里。于是一项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纪录由此诞生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毛泽东突出了“摧坚”,以之可以形容“飞夺泸定桥”的力破万难;朱德在许多年后撰写泸定桥的回忆

对联,仍旧写“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突

出了“夺关”,指出了飞夺泸定桥攻坚克难的艰险。因此,泸定桥精神其中第二个红色基因,便是“争当先锋,摧坚夺关的担当精神”。杨成武后来回忆飞夺泸定桥的历史说:“这一夜的行军,真称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二十二勇士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战斗堡垒的作用,能够冲锋在前。正是怀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敢于牺牲、最终冲破桥头大火,勇士们才夺得泸定桥。这其中便是泸定桥精神的第三个红色基因“不畏牺牲,志在必胜的勇士精神”。

红军行至泸定,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二郎山险峻,大渡河水流湍急,在铁索桥上没有木板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能够一边射击一边铺桥,并且相互配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力前进,可以说靠着出色的战役指挥和各部队的密切配合。这其中的红色基因便是“通途开路、紧密协作的团队精神”。

(作者系四川警察学院舆情研究中心 副教授、研究员)



理论与实践

州委宣传部 甘孜日报社 联办

◎主编:王光达 ◎责任编辑:雍西 赵春燕